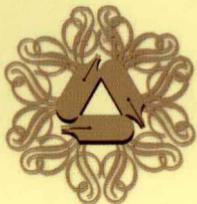


黄纯元图书馆学情报学 论文集

黄纯元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黄纯元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集

黄纯元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纯元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集 / 黄纯元著 . - 上海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 2001.7

ISBN 7-5439-1788-2

I. 黄… II. 黄… III. ①图书馆学—文集②情报
学—文集 IV. ①G25-53②G 3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8261 号

责任编辑：王慧娟

封面设计：徐 利

黄纯元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集

黄纯元 著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康路 2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1 印张 7.75 字数 215 000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100

ISBN 7-5439-1788-2/Z·983

定价：30.00 元

永不磨灭的记忆——缅怀黄纯元博士

(代序)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信息学系副教授、日本东京大学博士,我国著名中青年图书馆学、情报学家黄纯元同志是我的好学生、好同事和好朋友,不幸因病医治无效于1999年10月28日去世,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深感悲痛。纯元是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1979级学生,我系首届本科毕业生,他是一位优秀的学生,是青年学子中的佼佼者。他努力学习,虚心求教,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入学不久即引起不少老师和同学们的注意,受到系领导和任课教师们的赞许和关爱。我曾为本科生开设过外文参考工具书及社会科学情报工作概论两门课,在教学和接触中发现他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他在学习期间即开始参加宓浩同志领导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我领导的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工作,在师生教学相长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建立了友谊。由于年龄的限制,纯元本科毕业后未能报考本系的硕士研究生,他很失望,系领导和教师们也为他感到十分惋惜。后来,我们决定将他留系任教,担任宓浩副教授图书馆学概论课的助教。留系后,纯元工作十分出色,深受师生的赞扬,并曾获全校教学优秀奖。20世纪80年代底至90年代初,文化部曾组织全国图书馆学界人员集中编撰《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一书,我与孙云畴、宓浩、黄纯元4人也代表我系参加了这部记载我国当代图书馆事业业绩和历史的巨著的编写工作。记得在北京召开的一次编委和撰稿人代表的会议上,黄纯元作为与会代表中极少几位青年同志之一,在会上作了发言。由于发言内容水平较高受到与会领导同志及一些老专家学者们的赞许,纯元开始在我国图书馆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时曾有好几位领

导和老一辈图书馆学专家当面或以后通信都表示对他的发言和发表的论文极感兴趣和关怀，他们为我国图书馆学界又有一批新生力量的出现深感欣慰，我们也为拥有这样有才华的青年教师感到高兴和自豪。在我系所承担执笔起草的这本书的有关章节中，纯元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当时在一些与他同班的同学，或考取了硕士研究生，或出国深造的学生中，还有一些校外图书馆学界的中青年同行，先后离开了图书情报界，但是纯元却继续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埋头于图书馆学的教学和科研，同时开始为出国留学作准备，以实现他攻读硕士学位，甚至取得博士学位的愿望。苍天不负有心人，他的努力和毅力终于使他实现了自费东赴日本留学的目的。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的学习、工作（打工）、生活都十分艰苦。为了早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日以继夜地学习和工作，听导师讲授和研讨，参加学术会议和交流，跑图书馆搜集资料，撰写论文，还要课余打工，照顾家庭。他很辛苦也很忙碌，很快取得硕士学位，然后经过修完博士课程，撰写博士论文、工作实践、回校答辩等严格的程序，终于获得了东京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该校图书情报学专业授教育学学位），这在日本是很不容易的。他成功了，为中国留学生和他的母校和祖国增光，纯元是好样的。

在日本学成后的黄纯元，出于对祖国和事业的无比热爱和深厚的感情，他带着妻子和女儿毅然回国，又回到了他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尽管系的名称几经变动，由他出国时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改为情报学系，又改为信息学系，他也听到一些老师和同学的介绍，也和我通信讨论他今后的打算，提出他对当前国内图书情报专业教育的看法，并曾和他的日本博导讨论专业教育的发展趋势。他告诉我，他的日本导师希望他回国后不要离开图书馆学情报学教学岗位，要他为中国的专业教育努力工作，作出贡献，这与我们对他的期望也是一致的。他对当前国内专业教育的一些做法不理解，对办学方向和现状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出于对学科和事业的深厚感情和信心，他相信经过探索、反思、深化改革，专业

教育总有重振雄风的一天，他愿意为此奉献自己的一切。纯元是一个十分细心的人，为了学成归国，为了今后的去向，为了探讨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建设和图书情报教育，也为了他今后的工作，曾多次与我通信征求意见、交换看法。回国探亲时又来和我一起讨论问题，一谈就是半天，我们之间有很多观点是一致的或相似的。纯元对事业和学科的执著精神、奉献精神和深厚的感情令我十分感动，他的创新思想也使我十分钦佩。我为他能接受他日本导师和我的建议以及他的家庭对他的支持和他表现的决心和信心深感快慰。

纯元的回来，受到学校、学院、系和师生们的欢迎，也受到图书馆学界的欢迎，他的回系确实给系的教学和科研带来新的活力。在与纯元的接触中，我发现他这几年在日本的留学虽然艰苦还是很有收获的，也是很值得的。他告诉我带回的行李中大部分是他在日本收藏的专业用书，他在日本看了不少书，其中不少属于当今世界的一些著名的、最新的图书馆学专业著作，他打算回来后能多开几门新课。回国后虽然工作与生活条件都不如国外，而且他还抱病在身，但是纯元总把事业和学术放在首位，不去计较个人的得失。他除了在教学上受到好评外，还连续发表了不少优秀的学术论文，介绍了不少国外学术界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对学科研究作出了贡献。他曾和我一同参加了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的课题论证会，他与范并思副教授合作参加上海图书馆界资源共建、共享课题组的研究，并执笔写出研究报告，对活跃系和上海市科研活动是有成绩的。纯元对教育改革、学科建设和图书馆事业发展，对信息学系今后发展方向都有很多好的、有见地的、有创意的见解，对自己今后的工作也有一些新的计划。

20年来，我与纯元从师生关系发展到同事关系，以后又发展到挚友关系。他在学校学习时我们是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我曾说过，如果我们系招收博士研究生，黄纯元应当是最有希望成为首选对象。这也是我们赞成他留系任教和以后支持他东渡日本留学的重要原因之一。纯元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由于他作出的成绩及良好的学风，很早即成为本系社会科学情报研究集体的核心成员之

一，也是宓浩主持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概论课程教改的得力助手。他不仅参加宓浩主编的《图书馆学原理》教材的编写工作，并和我们一起参加了文化部组织的《当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一书的编写工作，也和我、宓浩、宋晓亮、范并思等一起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持的国家七五规划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社科情报理论与方法》课题组的编写筹备工作，还先后发表了不少有关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和社会科学情报研究等方面的论文，在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影响。纯元是我工作上的好同事，学术上的好伙伴。是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科研群体的重要成员。

纯元去日本留学后不久，我也退休了，我们在工作上没有什么联系，在学术研究上也少有合作机会，但是我们间的师生关系和同事关系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之间建立了忘年之交，并始终保持联系。虽然我们年龄差别很大，而且所处时代不同，但是我们都曾是从海外留学回国为自己的祖国服务，具有相同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与纯元这种挚友关系和情谊我想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在我们都认为图书情报事业，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科建设和为它们培养专门人才的图书情报专业教育都会在改革中发展，而且会持续地发展，因为国家和人民需要它们这样的信心。我们还认为今天的图书情报事业不同于过去的图书情报事业，明天的图书情报事业也不会与今天的完全相同，但是我们不同意“图书馆学消亡论”、“图书馆学过时论”，也不认为图书情报事业和学科建设能够没有图书情报专业教育。我们担心的是教育与事业、学科的三脱离和它们互动关系的恶性循环。尽管目前专业教育现状还存在不够完善之处，但是图书情报事业却在迅速发展，教育经过探索、试验、思考、变革，终将会向前发展。我想这些相同或接近的看法和理念应当是我们之间建立忘年交的主要思想和感情基础。我为纯元的归来深感快慰，为华东师大信息学系增强师资力量而高兴，我衷心祝愿纯元在事业上更大的成功，也为我们的一些共识而感到欣慰。

纯元是位热爱事业和热情待人的人。记得当他在东京大学忙于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和忙于迎接毕业考试期间，还慨然应我的约

稿为《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写了“新的信息环境下的图书馆和图书馆情报学(上、下)”一文,介绍和评述了当代国际学术界对于未来图书情报事业和学科的新理念和他本人的有关理念与见解,是一篇学术水平较高,具有较大参考价值的论文,在学术界反映很好,受到读者欢迎。我很赞同他在文中提出的许多观点,认为对澄清目前我国学术界的争论会有帮助,在我的著作中也曾多次予以参考和引用。纯元由日本回来后,虽然教学、生活安排任务很多,健康情况不好,但仍写出不少很有份量的文章。在《图书馆杂志》(上海)、《图书馆》(湖南)、《中国图书馆学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报》(北京)、《图书馆杂志(上海)1998 理论学术年刊》……等多种学术刊物上发表,活跃了我们的学术园地,受到了读者的好评。20多年来,纯元始终坚持刻苦学习,甚至在他患病期间也从不放松,他总是努力将教学与科研结合得很好,总在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这不仅仅是由于他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勤奋、求实的治学精神,而且也由于他的思想开阔、思路敏捷、思维超前,具有学者之风和教授之才。他的智慧、才能、学风、品德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学术成果就是最好的说明。

我一直认为黄纯元是一位很有才华、有个性、有创见、善于思考、待人热忱和在学术上能够崇尚民主自由和兼收并蓄的优秀中青年学者。是一位很有前途的人才。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是我校我系和我们图书馆情报学界及教育界的令人十分惋惜的损失,他壮志未酬,英年早逝令我们格外悲痛。他的学术业绩、教学业绩和对事业的执著精神,对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人的爱心与诚意和他的学术思想与理念都将在我们的记忆中永不磨灭。安息吧,纯元! 我们将永远怀念你!

陈 誉

1999 年 12 月于华东师范大学

东京大学大学院时期的黄纯元

(序 二)

岁月流逝，转眼间自黄纯元突然去世已经快有一年四个月了。1999年10月末的一天，华东师范大学的王珏突然给我研究室打来了电话，听到黄纯元去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地震惊，难以相信。日本留学期间，黄纯元曾经因为肝脏不好而住进东京大学附属医院接受治疗。我去医院看望他时，他看上去很精神，还对东大医院医生的态度发了一大通牢骚。出院后，黄纯元虽然又重新投入了研究，但我还记得他发病时的情景，看上去他的身体尚未痊愈。尽管这样，他还是顺利地完成了博士课程，基本通过学位论文，回到了中国。后来，我一直以为他在中国顺利地恢复了健康，回到母校华东师范大学投身于研究与教育，没想到会接到这样一个悲痛的消息，我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表达我的心情。

黄纯元是从上海来到日本，经过一年的进修后，于1991年4月进入东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硕士课程，1996年3月完成博士课程后回中国的。因此，包括研究生的时间在内，他在东大一共学习了6年。到目前为止，在东大大学院图书馆情报学专业学完博士课程的留学生只有4名（中国3名，韩国1名）。

包括黄纯元在内的完成博士课程的3名中国留学生中，一位是在黄纯元进入硕士课程时读完博士课程回到中国，在母校华东师范大学执教的王珏。另一位是当时还在读博士课程的四川成都来的李常庆。王珏是东大大学院图书馆情报学专业的第一位读完博士课程的留学生，现在在北京大学的李常庆是第二位，黄纯元是第三位留学生。只是王珏和李常庆是从位于筑波的图书馆情报大学读完硕士课程后进入东大博士课程的，他们的指导教师是当时

的教授长泽雅男(现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爱知淑德大学副校长)。我曾经和其他日本籍的研究生一起跟着王珏学过中文,和李常庆的一家也很熟悉,我和王珏、李常庆虽然都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从研究指导的方面来说,黄纯元是我指导的第一个留学生研究生。并且,黄纯元是在东大读完硕士和博士两个课程的第一位留学生,也是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东京大学第一位获得图书馆情报学专业博士称号的学生,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不仅对于我个人,就是对于东京大学图书馆情报学研究室来说也是一个有着特别意义的人物。

王珏、李常庆、黄纯元三个人的性格、关心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但都具有很强的研究能力,表现出强烈的研究欲望,我相信他们与日本学生相比并不逊色,甚至更加优秀。但是,在日语能力、特别是说写能力方面,黄纯元没有王珏和李常庆强。说实话,当时我曾经担心过这样的日语能跟得上研究生的课吗?但是,经过黄纯元的努力,他的日语能力有了显著的进步,虽然还没有达到王珏和李常庆的水平,但对话、作文基本上没有什么困难了。

进入硕士课程后,黄纯元来找我商量研究课题的事,当时他想把“图书馆的组织构造”作为研究课题,写关于这一方面的硕士论文。的确,在日本,关于图书馆组织构造方面的研究极少,过去仅有的一些关于大学图书馆组织方面的研究。在欧美、特别是美国的大学图书馆组织的研究则有相当的积累,我也觉得很有必要从组织构造方面研究图书馆,曾经考虑过写一些这方面的文章,所以收集了一些关于图书馆组织方面的文章。我把这些文章借给了黄纯元让他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成为论文的课题。可是,由于日本和中国的图书馆与美国的不同,图书馆作为一个经营体的独立性较弱,且大多为小规模的图书馆,经研究后我们认为即使对其进行研究也难以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于是,我们又重新进行了考虑,经过对二三个候选课题进行研究讨论后,最后决定以已经在美获得成功的、有关教育资料的收集、贮存、组织、提供的系统——ERIC作为研究的课题。

ERIC 系统可以说是社会科学领域中唯一成功的全国性的情报系统。日本对该系统也很感兴趣，已经有一些相关的论文发表。但是，这些论文都没有超出对 ERIC 系统以及 ERIC 叙词表的概括性介绍的范围。并且，听说日本也曾经想在教育领域建立一个像 ERIC 那样的全国性的系统，可是由于经费等的种种困难，最终没有能够实现。

黄纯元原来对社会科学情报就比较感兴趣，在中国也曾发表过有关 ERIC 的论文，所以就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并把它写成硕士论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马上开始收集相关的资料，他收集了以报告书为主的全日本可以收集到的所有的资料，并以此为材料完成了硕士论文。当然，要真正地研究美国的情报系统 ERIC 的成立过程，还必须获得美国联邦教育局的内部资料、各种会议的记录等第一手的资料，或者对有关人物进行面对面的调查，但这在日本要做到是很困难的。我觉得黄纯元的论文通过从 ERIC 的形成过程与它所处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出发，重点地对社会方面、制度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成功地克服了资料上的制约。他的硕士论文最突出的一点是论文中所包含的问题意识，即美国以外的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像 ERIC 那样的分散型情报系统模式的有没有可能存在的问题意识贯穿于整篇的论文。

黄纯元的硕士论文后来分成两篇论文，分别以“美国教育情报系统 ERIC 的成立过程”（《日本图书馆学会年报》），“美国教育情报系统的组织构造”（《日本图书馆学会年报》）为题刊登在学会刊物上，获得了专业研究人员的高度评价，被授予专门颁发给年轻研究人员的学会奖励奖。学会奖励奖是继前一年度李常庆获奖之后，第二次颁发给外国留学生。这不仅对我，就是对东京大学图书馆情报学研究室来说，也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

对于结束硕士课程进入博士课程的黄纯元来说，要继续进行研究的最大问题是经济上的和健康上的问题。黄纯元最初是一个人来日本的，但是记不清是在硕士 2 年级，还是在进入博士课程后，他把夫人和女儿接到了日本，一家三口人开始一起生活。由于

黄纯元的夫人和孩子都是在几乎不会日语的情况下来的日本的，我想当时他们在日常生活方面一定碰到了很多困难。特别是在经济上，由于黄纯元是在 35 岁左右才来日本留学的，而大多数财团的留学生奖学金有申请资格年龄的限制，他一直难以获得奖学金。因此，他当时一方面不得不靠打工维持生活，另一方面又要设法确保从事研究的时间。我没有直接问过黄纯元他是怎么会得肝炎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很后悔，生活上的过度劳累也一定是一个原因吧。

进入博士课程后，当上午由于身体不适而不能集中精力研究时，黄纯元有时也显得很烦躁。但是，凭着无论如何也要在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的坚强意志，他开始着手写博士论文。可是日本文科的博士学位和理科的博士学位不一样，极其难以获得，特别是东京大学的博士学位，其合格的标准非常高。事实上，东京大学的硕士论文有很多已经达到了美国的博士论文的水平，而博士论文则要求有比硕士论文更高水准的内容。

要写好符合严格的审查标准的博士论文，要求论文的内容有一定的广度，还要有独创性，所以选择论文的研究课题最为重要。我和黄纯元两人对几个可能成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商量。由于他对资料组织、情报处理等技术性的问题不太感兴趣，所以，我们把研究对象缩小到了可以利用他所擅长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制度性的问题的范围。后来，我们又对具体的课题进行了多次的讨论，觉得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一下中国的图书馆政策，并首先开始试着收集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可是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发现，如果仅仅对图书馆本身还不是十分发达的中国图书馆政策进行研究的话，研究范围太窄，作为博士论文是不够的。于是，我和黄纯元再次进行了商量并统一了意见，决定就情报技术发展以后现代中国所面临的情报流通体制问题，研究不仅仅是图书馆政策还包括情报政策在内的中国的情报流通体制的形成过程。并最后决定研究的时期为现行情报流通体制建立起来的解放初期。

记不清是在博士课程 2 年级快要结束的时候，还是在 3 年级

开始的时候,当我和黄纯元两个人在研究室讨论博士论文时,他对东京大学的博士论文审查制度提出了疑问,为什么东大不多给留学生一些博士学位?的确,到目前为止,要获得文科的博士学位非常难,外国留学生大部分学完博士课程,没有获得博士学位就回国了。所以人们批评说,亚洲各国的留学生来日本的大学院留学,与去欧美、特别是美国留学的相比很不利。根据这种情况东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虽然也正在讨论促进外国留学生获得博士学位的改善方法,但是,实际情况却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那时,我从日本的大学对于文科博士学位的看法和历史的角度作了很多解释,可是黄纯元却怎么也想不通。房间里的气氛变得很僵,最后我也生了气,说这个问题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没办法解决的,如果你对现在的体制不满的话,我以后就不指导你的研究了,就结束了谈话走出了房间。对我来说,这么认真地议论一件事,并且真的生了气,即使是对日本学生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后来,从黄纯元的博士论文的后记中我才知道,那时,他自己的身体能不能支持到论文完成抱着一种危机感,我想是这种危机感转变成感情上的冲突表现了出来。

后来,我自己也对没有考虑黄纯元的处境就说了“以后不再指导你的研究了”作了反省。就在我准备过一段时间就和他和解的时候,黄纯元来到了我的研究室,请我继续指导他的研究。我也对昨天的失礼向他表示了道歉,并再次担任了他的指导教师。现在,只要回忆起黄纯元,我首先就会想起这件事。

东大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为了促进博士论文的撰写,专门制定了为博士建立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的制度,指导委员会由包括指导教师在内的2、3位教师组成。于是,我们也为黄纯元建立了由高等教育论专家金子元久教授、东大大学院兼职教授学术情报中心内藤卫亮教授和我3人组成的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

博士3年级快要结束的时候,面临是继续留在大学院直到论文完成为止,还是先回国再提出论文的问题,黄纯元最后选择了后者。其中很大原因是希望在中国治病。于是,他于1996年3月完

成博士课程，回到中国去母校华东师范大学执教。回国前，指导委员会开了会，各位委员就论文的草稿发表了意见和建议。回国后不久，参考了委员会的意见后修改好的博士论文送来了。以后，我们又对论文的语句、体裁等交换了几封信。最后于1997年3月提交了学位论文“关于中国情报流通体制形成过程的研究——1949～1957年中国图书馆情报政策分析”。很快，一个由我担任主审的五名教师组成的博士学位申请论文（课程博士）审查委员会建立了起来。经过约半年时间的审查，从各位委员那里得到了论文达到了博士论文水平的意见。为了参加口头答辩，黄纯元从上海来到了日本。在口头答辩时，我见到了久别的黄纯元，他比在东大时虽然显得有些胖，但是反而让人觉得魁伟，看上去很健康，我一点都不怀疑地相信，他的身体正在朝着健康的方向好转。

口头答辩顺利通过，审查委员会内定论文合格，并预定在1997年9月24日的教授会上报告审查结果。可是，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由于当时还在暑假期间，参加教授会的教授比较少，这一天的教授会不开了。这件事使我很紧张。因为几天后，我就要作为文部省的在外研究员离开日本去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查珀尔希尔分校进行为期10个月的研究了。由于我不能参加下一次的教授会，只好在把报告的事委托给了审查委员金子教授后就离开了日本。我还清楚地记得，在美国听到审查结果被教授会承认，黄纯元获得博士学位的消息后，总算放下心来的情景。

虽然我还想起了很多关于黄纯元的事，但我用了这么多的篇幅只写了他在东大大学院时候的事，这是因为他是我指导的第一位获得博士称号的学生，并且是一位能够就学问进行认真讨论的朋友。现在，我们研究室都把黄纯元的学位论文作为一个标准，鼓励其他研究生以他的论文水平为目标进行研究。但是，很遗憾至今除了黄纯元以外，还没有一个人能获得博士学位。

当今世界，由于信息通信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的飞速发展，情报流通体制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图书馆情报学也正面临着变革的时期。特别是电子图书馆的出现，使得持续了数世纪的以印刷媒

体为中心的图书馆模式的基础发生了动摇。一想起我曾经希望和黄纯元一起长时间地好好讨论 21 世纪新时期的情报流通体制以及新环境下图书馆的可能性等问题时,对他的突然去世我感到无限的遗憾。在黄纯元给我的信中他曾经写道,非常希望将来成立一个“东大图书馆情报学研究室同窗会”,加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学术交流。我也曾期待着今后东大毕业生增加,组成以黄纯元、王珏、李常庆为中心的“同窗会”,可是现在却缺少了黄纯元,这真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不过,我深深地感到,我们有责任继承黄纯元的遗志,进一步促进和加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学术交流。

三浦逸雄 教授

日本东京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教授

王 珂 翻译

2001 年 3 月

目 录

自然科学技术情报工作和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应当协调发展	(1)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情报工作	(5)
“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吗?	(8)
略论社会科学文摘	(15)
传播学与情报学	(24)
知识交流和交流的科学——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	(28)
试论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发展道路	(42)
近年来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进展	(51)
发展战略和突破口——再论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发展道路	(59)
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的若干思考	(67)
社会科学情报教育简论	(82)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信息控制问题——日本的信息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92)
新的信息环境下的图书馆和图书馆情报学	(103)
图书馆与网络信息资源	(119)
“信息政策”的多义性及其原因——对英、美、日、中的相关文献的初步调查	(131)
论芝加哥学派	(142)
关于《电子图书馆的神话》	(164)
追问图书馆的本质——对知识交流论的再思考	(171)
信息政策的体系结构	(188)
寻求与社会科学的接点——读弗舍的《信息社会》	(199)

政治经济学视角中的未来图书馆论——读哈里斯和翰奈的 《走向未来:后工业化时代的图书馆情报服务的基础》…	(207)
变与不变之间——读伯克兰德的《图书馆服务的再设计》	
.....	(213)
附录一 黄纯元同窗追悼会上的发言	(218)
附录二 悼念黄纯元老师	(221)
后记	(226)